

韦来什·帕尔、戈洛维奇·约瑟夫  
(*Veres Pál – Golovics József*)

# 以国际视野从长远角度介绍 匈牙利高等教育融资

## 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税收制度下的负担分担



### 概述

本文主要研究从长远角度来看, 在就学时间外有哪些利益相关者, 以及他们实际上如何参与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本文以成本收益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税收制度为基础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本文认为, 实际负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制度, 参与者在合理的税收制度下将在未来通过间接方式完成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通过对比成本与收益可充分体现高等教育融资的功利性原则, 并给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和累进所得税制以及自费高等教育和线性所得税制结构组合提供理论论证。

**经济文献杂志 (JEL) 代码:** I21, I22, I26, H52

**关键词:** 高等教育、融资、成本收益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

韦来什·帕尔博士 哲学博士 (Dr. Veres Pál PhD) 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副教授 (pal.veres@uni-corvinus.hu), 戈洛维奇·约瑟夫博士 哲学博士 (Dr. Golovics József PhD) 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助理教授 (jozsef.golovics@uni-corvinus.hu)。

## 前言

近几十年来, 高等教育融资中国家(财政拨款)和其他分担方(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家庭的参与比例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情况适用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 但在中国也是如此。截至2000年, 国家资源在中国大学预算收入中的占比不到50%(Keczer, 2016a), 公立大学来自学费的收入在2000年代也逐渐增高(Mok, 2012)。这一过程与西方国家早在1960年代已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有着密切关系(Hrubos, 2021), 但中国直到新千禧年代才达到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Keczer, 2016a)。虽然在大众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中, 均是国家发挥重要作用, 但外部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所有国家都无法维持这一进程。因此, 需要对高等教育体系融资问题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金流动进行深入剖析。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 融资在专业文献中均是一个被从多个角度探讨的议题(Barr, 2004; Nagy et al., 2014; Vossensteyn, 2004; Lentner, 2007)。在探讨中私人和公共融资均有涉及。同时, 还需着重探讨两种形式和资金来源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 从而理解在不同资金流向的情况下教育成本实际分担如何变化, 以及专业术语中的“长期”融资到底是什么。当今全球化下的高等教育(Golovics-Veres, 2020)的特点是公共利益相关者的国际互动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外国留学生可在接收国的公立机构以自费或奖学金的形式参加学习, 奖学金由输出国或接收国政府提供均可(后者例如匈牙利政府为来自东方国家的学生提供的Stipendium Hungaricum奖学金)。

外国公立大学可在接收国设立校区(例如计划在匈牙利设立的复旦大学校区), 由两国共同出资, 除两国公民外, 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可在此就读。然而, 在这种情况下, 将融资分为私人和公共部分往往会失去意义。因此, 应当超越先前的二分法, 从各个利益相关者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本文的观点也同样指向税收制度在高等教育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方向。克里迪·弗朗索瓦(Creedy-Francois, 1992)以及辛德勒(Schindler, 2011)从福利角度研究税收和学费相结合对教育的影响也恰恰证明了此点。根据后者的理论, 韦来什(Veres, 2012)也将累进个人所得税称为学生事后贡献(私人融资)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谢姆延(Semjén, 2013)在讨论成本分担时也对各种学费结构, 包括对事后成本分担机制以及税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希望聚焦于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金流动, 并与高等教育给相关人员带来的利益进行对比。在本文来看, 如此可获得更完整的全貌, 不仅是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负担分担, 还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所了解。本研究的基本要素是在超出培训时间外的时间维度中将成本和利益的关系视为长期联系。需要强调的是, 系统运行需要有持续的融资, 只有从长远角度才能定义实际成本负担和成本负担者, 这样也可以清晰定义“短期融资”。尽管如此, 本文还是认为, 从长远角度分析总资金流动量的情况下, 成本负担将与目前普遍基于短期理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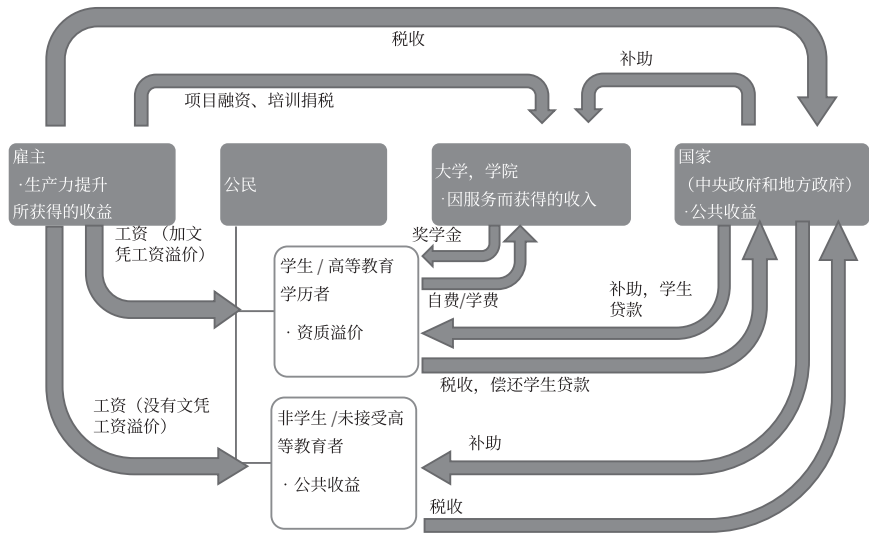
统计的数据所有不同（OECD，2020）。个人所得税制度越累进、消费税越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事后（在毕业后因其文凭而获得工资溢价，由此提高消费水平缴纳更多的消费税，并通过税收制度间接为高等教育融资做出事后贡献）对融资的贡献就越大。同时，从雇主角度，高学历雇员所带来的附加值可使利润更高，因此，所支付的工资溢价和利润税（企业税）的一部分也可视为对高等教育的事后贡献。

综上所述，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识别高等教育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随后对他们之间的资金流动（对比其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利益）进行探讨。结合相关理论背景以及成本效益原则试图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成本分担进行全面的概述，并在单独的章节中讨论税收制度与成本分担之间的关系。最后，以结论结束本文。

资金流动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教育资金流动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以下几类：雇主、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以下简称“学生”）、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以下简称“非学生”）（以此区分开受过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与学院以及国家。以上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服务中作为受益方或作为成本负担方存在。图1、诠释了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资金流动。

图1：高等教育中的资金流动



来源：自制图

在下文中, 本文将讨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资金流动(如图所示)。在这些互动(交易)中时间是重要维度, 因为成本和收益可能在不同时间出现。因此, 为尽可能准确的介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本文必须在给定关系的相关时间段内对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根据市场逻辑, 成本收益比的平衡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然而, 考虑到各国高等教育政策除效率外还存在其他目标(公平、稳定等), 因此, 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想平衡状态有一定差异。

### 学生利益和成本负担

提供教育服务是分析资金流动的起点, 属于学生与大学或学院(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易。基于人力资本理论(Becker, 1962), 学生从中受益, 获得了知识、增加了自己的人力资本(生产能力), 经济层面主要体现在更高的生产力(附加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市场优势, 尤其在因文凭所产生的工资溢价中。沃森斯坦(Vossensteyn, 2004)曾概述了高等教育学历可以给个人带来的金钱类和非金钱类利益, 例如更高的储蓄率、更好的健康状况等。

在一般的市场交易中, 消费者(本研究中即学生)通常要为这些有用的服务支付费用, 也就是说由他们直接负担费用。当然, 高等教育中也有这类例子, 学生以自费形式接受教育服务时需向大学支付相应的学费。<sup>1</sup> 然而, 值得强调的是, 即使在自费模式中也并非由实际受益人来负担该费用, 学生在完成高中学业, 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时, 大多没有独立的收入和经济能力。因此, 通常不是他们本人, 而是由其家庭负担“自费”的金额。这一事实日后可能在特殊情况下衍生出与家人之间的“算账”问题。<sup>2</sup> 对于那些在家庭支持下依然无法支付学费的学生而言, 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可提供各类学生贷款计划供其选择。此类情况下显然存在事后结算的问题, 在完成学业后, 通过高生产力的收入来偿还学生贷款。因此, 这种机制也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事后融资, 其中大部分费用还是由学生自行负担。<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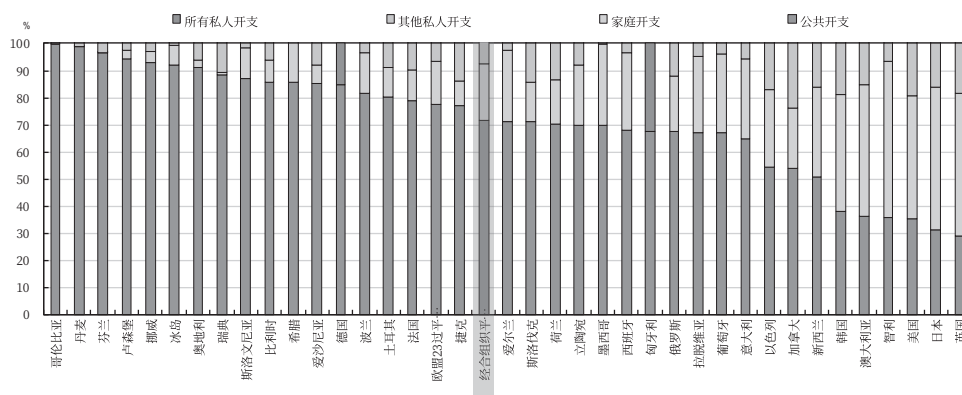
当然, 就读期间学生(家庭)直接负担费用可能会在公平和机会平等方面遭到质疑。学生贷款则是可能应对这一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 经济困难家庭的借贷意愿可能较低(每个国家由于文化原因情况不同), 或者可能导致学生负债, 形成负资产, 从而在独立生活开始时造成劣势。当然, 该资产为负的情况通过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可转正, 但也需要多个外部(例如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情况)和内部(合适的职业选择、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良好表现等)条件支撑。由此可见教育的投资风险性(人力资本)以及个人责任的重要性。

## 代表公共社会的国家融资

根据全球惯例以及综上所述, 高等教育服务的费用并非只由受益者、学生以及有关家庭负担。除有公平方面的考虑外, 也有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代表公共社会行政的国家因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性质和正外部性影响——Veres – Golovics, 2012)而分担相关费用。例如更高的国家生产力、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或更低的犯罪率(关于社会福利相关的信息可参见沃森斯坦2004)。在该情况下, 学生可接受完全或部分免费的高等教育, 费用由国家通过调节社会其他群体, 哪怕是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服务的公民来分担。此时, 成本效益原则将通过整体社会收益而实现。关于后者与成本的关系以及这类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的合理性超出本研究范围。<sup>4</sup> 无论如何, 基于内迈特(Németh, 2012)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高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一直为正, 但同时也可看到,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低于个人回报率。除公共分担费用之外, 高等教育中通常个人收益会显著高于社会收益也是主要原因(Vossensteyn, 2004)。

图2、展示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同时关注时间维度和税收制度在成本分担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该图展示了从传统、限于就学时间内的短期思维以及直接融资方式分析的数据。可见, 各国之间的公共和私人融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 很难单纯基于成本效益原则来解释这一现象。

图2、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公共和私人直接融资比例 (2017)



来源：基于经合组织 (2020) 数据。<https://doi.org/10.1787/f456fd53-en>

基于以上数据, 本文可以假设在公共融资非常高的国家存在某种事后贡献, 例如通过税收制度的间接性私人融资。在私人融资非常高的国家则可假设税收制度的边际税率较低。<sup>5</sup>

匈牙利高等教育有三种制度(国家全额奖学金、国家部分奖学金和自费)可供学生选择。《国家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各个制度的成绩要求。无论如何,



这使执行以成本效益原则为基础的融资变得更加复杂, 更难分析。如果想强制“受益人”也分担费用, 那么接受国家奖学金的人在完成学业后, 可以通过事后直接(教育费附加)或间接(通过其他税收制度)的方式实现。目前, 未有可“补偿”、平衡自费学生高个人贡献的解决方案。不同制度之间的转换被视为一种激励机制, 但从根本性质上来看并不能促进成本收益比的平衡。当本文提到国家以及公共资金时, 除中央政府外, 也无法回避各个地方政府的作用。在融资中后者的参与和“内部移民”问题密切相关, 也是成本效益融资中最冲突的领域之一。如果纵向层面看学校系统, 那么从某个城市考入高等教育机构并获得文凭的公民从其家庭和国家层面均获得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国家层面冲突由国际移民引起(Golovics, 2019)。而该问题通过内部移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地方利益是有更多从该地区考入高等教育机构的人作为雇员或企业家回到该地区, 并用其人力资本造福该地区。尽管匈牙利国内移民率非常低, 只有年轻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才有意愿移民(Sebők, 2016), 这一情况则更加强了国内的不平等发展。因此, 在中短期内减少由此产生的失衡是切实的目标。为此, 地方政府可在鼓励毕业生回归的资助计划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 需要重点提一下匈牙利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运营的, 旨在改善机会不均等的Bursa Hungarica高等教育市政奖学金。“匈牙利乡村计划”也值得一提, 是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合理支持, 以补偿、减少、甚至扭转国内人才流失。<sup>6</sup>

如何解释国家为来匈外国大学(例如复旦大学计划在匈牙利建设校区)提供资金的合理性, 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专业界都是一个特定问题。根据本文作为出发点的成本收益理论, 所预期的社会收益是国家参与融资的合理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一个新型高等教育文化的出现以及通过合作和竞争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同时, 还应提到增强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人才的能力(不仅是针对中国教师和学生, 还涉及区域甚至全球层面)。在大学成功运营的情况下, 也不可忽视来自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资源。此外, 毕业生如留下, 他们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可被视为社会收益, 如离开, 则可在国际关系发展领域使匈牙利受益。因此, 在此类决策中, 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比社会收益和相关成本可有效评估投资的“合理性”。

### 公共融资作为公共负担

关于公共负担的研究仅停留在简单地将公共融资认定为“公共资金”是个错误。本质上国家没有“自己”的钱, 尽管在上一段中已经提到, 该模式中实际负担是由社会分担, 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依然有其必要性。如图1、中的收入流向所示, 国家的收入以税收形式来自多个利益相关者。<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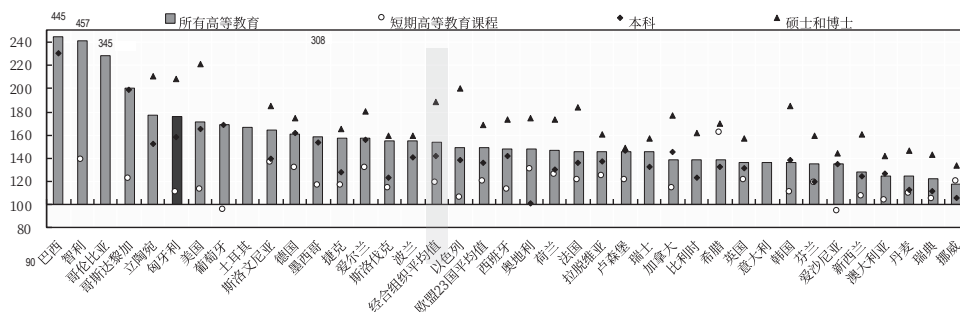
公民本人是税收的贡献主体, 通过工作和消费向公共财政系统缴税。其中, 既有接受过, 也有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然而, 显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公共负担参与到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中。根据成本利益原则, 模式的合理性是

该部分群体依然从整体社会收益获得了相应的份额。然而，图一所示关联也清楚地表明，在国家融资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就读的公民也同样参与了公共负担分担。这类参与如学生贷款计划一样属于间接和事后型，国家以免学费形式向学生提供准贷款，毕业后，因学历带来的更高生产力使其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通过工资税的方式偿还。以上均表明，税收制度在高等教育的实际负担分担中起着关键作用，税收制度的性质（不同类型税收的占比，使用单一或多重税率以及税率高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负担分担的比例（当然，可以将负担分担与其获得利益的程度进行对比）。本文稍后将详细讨论该部分。

### 雇主在高等教育融资中的参与

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则是雇主。他们雇佣了从高等教育机构毕业，拥有更高人力资本价值和生产力的雇员，从而享受因此带来的红利：更高的企业生产力、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关于后者，舆论中常常会提到雇主也应当在负担成本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这样的提议会使人产生目前并非如此的误解。事实上，如图一所示，雇主或直接或间接地负担了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一方面可通过特定协议与大学建立直接联系，例如资助大学的奖学金计划和科研项目。<sup>8</sup> 另一方面，通过缴税为国家预算提供资金，并且由于“使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公司利润更高，缴税的金额也会随着具有高等教育文凭雇员的人数而变化。第三，也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雇主为“使用”其技能和更有价值的人力资本而直接向雇员支付工资。如图3、所示，向他们支付的工资通常远高于学历较低的雇员。介于所得工资还需缴税（或偿还学生贷款），因此，可看作雇主通过支付源于高等教育学历的工资溢价事后和间接地参与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sup>9</sup>

图3、经合组织国家中高等教育学历者工资溢价与中等学历者工资比较（2018）



来源：经合组织（2020）数据 <https://doi.org/10.1787/888934162470>。

### 激励和补偿: 奖学金、助学金

除上述外, 图1、中所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其他现金往来也值得一提。这类资金流动之一是奖学金, 由教育机构向学生支付。<sup>10</sup>这类津贴可基于学习成绩或家庭收入水平发放, 值得强调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除人力资本增益外, 还从大学获得了另一类“收益”。如前述, 这一资金可能分担到社会其他不同群体上。奖学金在本研究的成本收益逻辑中可视为一种动态激励, 旨在通过提高能力水平来增加就业后的个人和公共收益。根据图中所示, 国家奖学金作为公共成本的回报体现在社会收益上, 而个人收益则通过税收制度回馈给社会。助学金方面也需强调其动态效应, 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和更广泛的人才开发, 在上述机制内通过对个人和雇主的收益征税增加公共利益。

此外, 国家对公民的相关补贴也值得一提(该类别甚至包括享受各类公共服务, 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讨论货币性补贴)。虽然有很多反例, 但其中绝大多数基于社会条件, 主要针对财务状况较差的公民。鉴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往往收入更高(如图三所示), 并且对政府的依赖较少, 此点也常常作为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被提及(Vossensteyn, 2004), 因此可推断, 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获得这类补助金的比例较小。虽然, 本文讨论的是多重现金流和具有显着概括性的社会群体, 但原则上可将这类补贴看作是对没有从高等教育中获利的公民的一种“补偿”(部分来自高等教育学历人群高收入的工资税)。然而, 在此关系中负担和收益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点均有差异, 取决于税收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高等教育融资方法等。因此, 在每种情况下都应分别分析。

## 税收制度在成本分摊中扮演的角色

如上一章所述, 税收制度在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分担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 以下将对不同税收解决方案对成本分担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将其与高等教育融资的基本形式相结合。

首选应对个人劳动所得税进行探讨, 其制度基本可分为两类: 线性或累进性。<sup>11</sup>累进税制的情况下, 高等教育学历群体通常可获得更高的收入(见图3、), 因此更高的边际税率以及平均税率适用于此类收入较高的群体。相对于收入较低, 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 前者起码大体上在绝对金额和比例上均缴纳了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他们分担了更多, 包括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负担。因此, 累进个人所得税理论上非常适合“政府融资”, 即免学费高等教育体系: 该体系中国家(间接由社会)承担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 并在学生就业后通过对其高收入的征税以事后、间接的方式回馈于社会。因此, 在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 使用累进所得税从支付能力和收益原则(Musgrave —



Musgrave, 1993) 层面均应视为公平。<sup>12</sup> 从后者角度出发, 获得越多公共服务的人(此处侧重于高等教育)应承担越多的公共负担。在累进所得税制度之外, 高等教育融资采用双重制度(例如匈牙利)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该情况下, 针对自费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群体, 更高的税率同样适用于其学历工资溢价, 等于他们支付了“双倍”的学费。因此, 在此种结构中, 基于成本收益原则, 可考虑为自费获得文凭的群体提供某种税收减免。与此同时, 在高等教育为自费形式的国家应用线性所得税率则更为合适。其背后的规范性论证是如国家未参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也不应当以税收形式按比例扣除其学历工资溢价而享受“成果”。<sup>13</sup>

消费税问题也可以基于同样角度分析。出发点是原则上拥有更高收入的高学历群体消费的也更多。然而, 根据一般经济学分析, 绝大多数人的消费与收入之间不呈现绝对比例关系。因此, 如果国家提供免费高等教育, 并希望通过消费税制实现上述收益原则, 可能会导致每个产品类别的增值税率不同: 出现富裕群体经常消费的产品税率更高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高收入群体可将为消费的资金用于储蓄和投资, 因此, 从高等教育融资角度看, 可通过以更高的税率对投资征税来实现收益原则。<sup>14</sup> 匈牙利的情况与本文的研究角度也有所关联, 较低的单一税率个人所得税, 以及“必然”较高的消费税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家中都算很高), 特别针对高收入群体消费产品。

由于详细的比较分析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在此仅以三国为例。匈牙利拥有与全球水平相比较低的15%的单一税率个人所得税、9%的企业税和27%的标准消费税(Trading Economics, 2021a), 搭配高等教育融资中略高于30%的“直接”私人负担比例。相比之下, 瑞典采用多税率、高累进个人所得税制, 边际税率最高为53%, 企业税为20%, 标准消费税为25%(Trading Economics, 2021b), 搭配高等教育融资中“直接”的公共融资高达将近90%。根据本文的分析, 通过事后税收制度进行私人融资(对公共融资的贡献)在瑞典体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至于中国, 与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50%直接国家融资相呼应的是45%的个人所得税, 25%的企业税和13%的消费税(Trading Economics, 2021c)。上述数据显示, 关于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与通过税收制度进行的事后融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假设完全成立。然而, 由于税收制度的复杂性、经济和社会政策偏好的变化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上的差别随着时间变化在相关度的强弱上有所差异, 有必要展开超出本研究范围的更全面、覆盖更多国家的深入研究。

## 结论

本研究从多个不同视角审视了高等教育融资的重要问题, 部分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使用的基于高等教育系统融资的成本收益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方法, 联系体制整体的成本收益关系, 结合税收制度来阐释其中的收支平衡理念。其重点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必须与其通过高等教育所获得的收益形成联系。根据统计数据本文可以判断, 不同国家在私人 and 公共融资比例以及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 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成本收益理论的作用相矛盾。因为该统计数据仅根据直接资金来源区分私人 and 公共融资(成本分担)。本质上只展现了高等教育机构预算中涵盖了哪些直接收入。并没有对例如在取得文凭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事后做出的间接贡献进行分析。作为利益相关者间资金流动的“媒介”, 公共财政、税收制度和财政预算的参与尤为为重要, 并可在分析中借助它们追溯到最终的实际成本分担。所以本文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其重要性在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获得公共融资所需的“资源”。因此, 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 国家如何对雇佣持有高等教育文凭雇员的雇主及高等文凭持有者本人的征税则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 理论上如果直接融资中私人贡献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那么这种“不成比例”的情况可以通过较低平均税率、低累进或单一税率个人所得税制等税收制度进行调整。这样的税收制度不会从社会抽走用于承担教育成本的资金。在此类制度中, 用于支付学费的学生贷款是一个自然、动态的资金搭桥元素。反之, 在直接融资中国家参与度较高的情况下(免学费、“免费”高等教育), 可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更高的平均税率、多税率、累进制度、高边际税率)实现私人贡献。消费税也可在事后私人融资或补偿中发挥类似作用, 但由于税收类型的间接性, 在实际分担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此外, 本研究指出, 雇主通过支付持有高等教育文凭员工的工资溢价以及纳税形式间接地参与了高等教育融资。

结合税收制度更清晰地展现高等教育融资在不同国家利益相关者间的成本分担情况, 以及各种机制产生的副作用, 尤其是公共中最重要的人才的挖掘、使用和培养, 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匈牙利的双重融资制度“显然”使基于收益的成本分担变得难以管理。匈牙利的相关工资溢价较高, 但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群体的工资在国际上属于较低水平, 这也支撑了在单一税率制度中实施低税率的合理性。同时, 与国际水平相比, 较高的消费税可视为征收了相应部分的私人收益。

## 尾注

- <sup>1</sup>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应在就学期间支付学费,但也有文献讨论事后或延迟支付学费或贡献的可能性(参见例如谢姆延,2013),正是对本文所探讨的成本分担时间迁移问题的一种相应。
- <sup>2</sup> 尽管超出本研究范围,但在进一步研究时需关注,学费不是由学生本人,而是由其家庭承担这一事实,按照科尔奈(1980)理论可解释为前者具有软预算约束。但这会严重削弱本文所提出的激励论点。
- <sup>3</sup> 国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分担负担中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国家助学贷款计划与市场其他替代方案相比的有利程度。
- <sup>4</sup> 戈洛维奇(2019)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角度,即移民产生的回报问题。
- <sup>5</sup> 该假设的验证可作为以后的研究主题。
- <sup>6</sup> 参见韦来什(2018)关于增加外地,尤其是乡村吸引力的研究。
- <sup>7</sup> 由于流入国家预算的资金以及整个公共财政体系结构的全面概述超出本研究范围(详情可参见兰特奈尔,2017)。因此,本研究只关注高等教育相关因素以及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收入流动。
- <sup>8</sup> 从规范性角度来看,判断通过该渠道获得的资金体量存在争议,但需要认识到,一般这类融资均基于双边协议,其中对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回报率是决定性因素。
- <sup>9</sup> 此处需提到,全球化导致营运资本在流向全球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基于收益的成本分担而造成严重的不成比例。本文认为,在同等生产率的情况下工资水平明显不同代表使用运营资本的企业并未按其获益比例对劳动力输出国的高等教育成本做出贡献。
- <sup>10</sup> 当然,学生也可从图一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处获得奖学金。但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无法对此做详细分析。
- <sup>11</sup> 第三种累退税类型,由于篇幅原因以及缺少相关性因此不做分析。
- <sup>12</sup> 当然需要分别对累进程度、公平性和最优性进行研究。
- <sup>13</sup> 在该结构中,同前述,高等教育融资可以通过市场或准市场的方式,以贷款或助学贷款形式实现。但需要明确的是,在此情况下也存在事后偿还(类似于国家融资和累进税制度),区别在于公民未使用工资溢价缴纳更多税款,而是用于偿还(学生)贷款。
- <sup>14</sup> 除在此讨论的内容外,税收制度也可通过其他直接渠道来实现基于收益原则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例如沃森斯坦(2004)在其研究中提出的文凭税(graduate tax),该问题分析需要单独展开研究。关于税收制度的概览可参考迪奇的研究(2006)。

## 参考文献

- Barr, N. (2004):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牛津经济政策评论》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0, pp 264-283
- 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投资于人力资本-理论分析》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0, No. 5, pp 9-49.
- Creedy, J. – Francois, P. (1992):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gressive Taxation: Equity, Efficiency and Majority Voting 《高等教育和累进征税: 公平、效率和多数表决》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19, No. 4, pp 17-30.
- Dietsch, P. (2006):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the case for a graduate tax 《高等教育的融资: 毕业生税的案例》 *The Ethics Forum*, Vol. 1, No. 1, pp 88-102.

- Golovics, J. (2019): Addressing the EU's East-West Brain Drain: Why a Tax Solution Would Be in Vain 《解决欧盟东西方人才流失问题: 税收解决方案为什么会徒劳无功》 *New Perspectives*, Vol. 27, No. 2, pp 63-85.
- Golovics, J. – Veres, P. (2020): 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高等教育互相接近: 在“无摩擦”空间的竞争与合作. *Polgári Szemle*, Vol. 16, Chinese Issue, pp 212-225.
- Hrubos, I. (2021): A 21. század egyeteme 《21世纪大学》赫鲁波斯·伊尔迪科(编辑)《博洛尼亚塔的信息》 In: Hrubos Ildikó (szerk.): *A bolognai tornyok üzenete*. Gondolat Kiadó, Budapest
- Keczer, G. (2016a): Felsőoktatás Kínában 2.: decentralizáció, piacositás, privatizáció és nemzetközi nyitás 《中国高等教育2.: 分权、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开放》 *Közép-Európai Közlemények*, Vol. 9, No. 1, pp 147-157.
- Keczer, G. (2016b). Felsőoktatás Kínában 3.: A mennyiség és a minőség ellentmondásai 《中国高等教育3.: 数量与质量的矛盾》 *Közép-Európai Közlemények*, Vol. 9, No. 2, pp 61-71.
- Kornai, J. (1980): *A hiány* 《短缺经济》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 Lentner, Cs. (2007):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ungarian University Based - Knowledge Centres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Higher Education Area 《匈牙利大学知识中心在欧洲经济和高等教育中的竞争力》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6: 2 pp. 87-100.
- Lentner, Cs. (2017): *Közpénzügyi menedzsment* 《公共财政管理》 Dialóg Campus Kiadó, Budapest
- Mok, K. H. (2012):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带回国家》 In: Restor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再中国高等教育中恢复国家的作用》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7, No. 2, pp 228-241.
- Musgrave, R. A. – Musgrave, P. B. (1993): Az egyenlő teherviselés (az adózási méltányosság) megközelítési módjai 《平等负担分担(税收公平)的方式》 *Szociálpolitikai Értéktér*, No. 1-2, pp 32-56.
- Nagy, S. Gy. – Kovács, G. – Németh, A. O. (2014): Governance and Funding of Higher Education –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Best Practices 《高等教育的治理和融资 – 国际趋势和最佳实践》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16, No. 21 pp 180-184.
- Németh, A. O. (2012): Felsőoktatás-finanszírozás Kelet-Közép-Európában 《中东欧高等教育融资》 In: Temesi József (szerk.): *Felsőoktatás-finanszírozás. Nemzetközi tendenciák és a hazai helyzet* 《高等教育融资: 国际趋势和国内形势》 Aula Kiadó, Budapest, pp 67-102.
- 经合组织 (2020) 《2020年教育概览》 经合组织指标, 经合组织出版社, 巴黎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69096873-en>.
- Schindler, D. (2011): Tuition Fees and the Dual Income Tax: The Optimality of the Nordic Income Tax System Reconsidered 《学费和双重所得税: 重新考虑北欧所得税制度的最佳性》 *German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1, pp 59-84
- Sebők, M. (2016): *Munkaerő-piaci mobilitás Magyarországon* 《匈牙利劳动市场的流动性》 Edge 2000 Kiadó, Budapest
- Semjén, A. (2013): Költségmegosztás a felsőoktatásban. Utak és tévutak 《高等教育中的成本分担: 道路和谬误》 MTA KRTK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 Trading Economics (2021a): *Hungary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 匈牙利个人所得税率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hungary/personal-income-tax-rate> (2021年10月12日)
- Trading Economics (2021b): *Sweden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 《瑞典个人所得税率》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weden/personal-income-tax-rate> (2021年10月12日)

- Trading Economics (2021c): *China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 《中国个人所得税率》<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personal-income-tax-rate> (2021年10月12日)
- Veres, P. (2012): A költség-haszon elv értelmezhetősége a hazai felsőoktatás finanszírozásában 《匈牙利高等教育融资中成本收益原则的可解释性》*Polgári Szemle*, Vol. 8, No. 1-2, pp 100-122.
- Veres, P. (2018): A magyar falu múltja és jövője a részt vevő megfigyelő szemével 《与会观察者眼中匈牙利农村的过去和未来》*Polgári Szemle*, Vol. 14, No. 4-6, pp 213-225.
- Veres, P. – Golovics, J. (2012): Az állam felsőoktatási szerepvállalása 《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Ezredvég*, Vol. 22, No. 5, pp 99-119.
- Vossensteyn, H. (2004): Fiscal Stress: Worldwide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财政压力: 高等教育融资的全球趋势》*Journal of Student Financial Aid*, Vol. 34, No. 1, pp 39-55.